

# 知识青年与毛泽东时代的 农村经济发展

韩起澜 赵晓剑 (著)<sup>①</sup> 罗湘衡 (译)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 本文考察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它验证了知识青年旨在改善农村生活水平所作出的种种努力,更为重要的是,地方干部如何借助知识青年的存在以获得设备与技术培训,并运用他们的技术与教育来促进乡村工业的发展。设置于城市以及县镇的知识青年办公室无意中为边远的乡村县域和大中心城市之间提供了联系,确保了从电线、广播器材直到拖拉机、工厂机器设备在内的数量庞大的原材料在城乡之间的转移。最后展现了知识青年、他们的家庭以及城市与农村的官员——他们均无法决定政府的政策——对资源的辨识与运用均远远超出了上山下乡运动的预期。

(关键词) 知识青年; 农村工业; 城乡关系; 知识青年办公室

(中图分类号) A8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999(2016)01-0022-11

魏民是一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到江西省乐安县的一个生产队从事劳动的知识青年,他于1971年4月某日被党委书记召去谈话。得知将被调往县里的工业管理机关之后,魏民既高兴于不必继续在田间劳动,也惊奇于自己的好运气。但他很快获悉存放于当地知青办的个人档案已被县领导审阅过,后者了解到魏民的父亲是一家电线工厂的厂长。县领导前往位于上海的魏民家中拜访了其父。魏父随后答应将提供设备以在乐安县建设一家类似的电线厂。魏民将在上海

参加培训,稍后将被派往当地以援助建厂行动。<sup>②</sup>

魏民的故事迥异于绝大多数针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这一运动始于1968年,为响应毛泽东要求城市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呼吁,最终超过1700万城市青年在农村地域生活了整整12年。针对这场运动的记忆与分析往往聚焦于城市青年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表达出他们对当时生活的伤感。魏的经历展现了长期以来这场运动在上述回顾性的讨论中被遮蔽的重要

<sup>①</sup> 本文原作者韩起澜,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赵晓剑,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

<sup>②</sup> 参见2013年8月4日在上海对魏民进行的访谈。

(收稿日期) 2015-09-25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东北师范大学教师教学发展基金项目“改革‘爱国主义’课堂教学效果的创新实践”(15BOQWJ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罗湘衡(1984-),男,湖南长沙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系讲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德国政府与政治、政治学理论、思想政治教育。

方面：知识青年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为了缓解农村过于艰苦的生活条件，知识青年在自己家庭的帮助下，向农村地区转移了大量物资；他们凭借自身的能力从事技术培训，以帮助农村居民设置、使用以及修理机械设备。他们的父母与城市领导干部希望改善知识青年的生活与工作条件，用尽一切力所能及的手段提供地方领导干部所期待的物资。

几乎就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的同时，中央政府也开始提倡发展农村企业，尽管中央并不提供实现上述发展所必需的财政与物资资源。此外，绝大多数农村干部，尤其是身处偏远地区缺少同中心工业城市的任何联系。在某些情境下，正是城市青年能够提供他们所亟需的这种宝贵联系。诸多农村领导干部凭借城市青年的存在以获得设备与技术培训，并利用其技术与教育来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背后，实际上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纠缠着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复杂关联，它通过城市知识青年的社会关系网络予以实现。这些关联在很大程度上不为人知，但却对后来的农村经济改革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本文聚焦于来自上海的知识青年，目的旨在驳斥先前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经济发展的研究，尤其是涉及知识青年的学术成果。通过上述研究，特别是由 Michel Bonnin 所主持的综合研究，我们了解到政府发动上山下乡运动的初衷、各种配套政策以及动员广大青年的方法，知晓了知识青年在农村的艰苦经历，从他们生活与工作的贫穷境况到他们所忍受的许多痛苦。<sup>(1)</sup>

借助近期方才解密的地方档案，我们的研究聚焦于一系列事关知识青年运动的新问题，同时将这场运动视作窥探“文化大革命”期间城乡关系的一面镜子。最终，我们的观点并非对知识青年运动抑或它对于个体青年的影响做出判断。作为替代，尽管这场运动的公开意图旨在对城市青年实现再教育与农村化，我们希望阐述其实践与效果缘何迥然不同。更加具体的是，我们旨在分析知识青年、其家庭以及城市和农村的领导干部——他们都无法决定政府的政策——以怎样的方式使得对资源与社会关系网的辨识与利用远远超过了政策的预期。<sup>(2)</sup>虽然国家经济计划禁止跨

区域贸易，然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却为农村领导干部提供了回避官方渠道与政策的途径。

### 一、食品、衣物与种子

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城乡二元分割颇负盛名。<sup>(3)</sup>拥有国有企业以及庞大基础设施的大工业中心城市为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提供了维持一生的就业、高福利住房、医疗保险、教育以及获得原材料的契机，这些在农村皆不可得。与此同时，农村居民被要求向城市提供粮食与其他资源。正如历史学家 Jeremy Brown 所指出的“在 20 世纪 50、60、70 年代，城市变成了特权地域，而乡村变成了倾销地。”<sup>(4)</sup>一套极其严格的居民户籍制度阻止了向城市的移民，并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针对私有商业贸易的打压也剥夺了农村居民从其他区域获得物资的可能性。<sup>(5)</sup>

在这一背景下，对于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与 70 年代的几乎所有知识青年来说，一段最初的经历在于直面中国的城乡之间在物质资源可得性上的巨大鸿沟。历经从上海到云南西双版纳的 10 天火车、公共汽车与轮船的旅程之后，一名年轻人在一封家信中辛酸地描述到这一切。在云南省会昆明，他在百货商店目睹了上海制造的商品，然而却得知购买这些物品需要政府颁发的票证。当他到达国营农场所在的景洪县之时，他发现商店的货架上空空如也，甚至缺少当地种植的水果。在国营农场的商店中可以买到的物资仅仅是断路器。他在一封家信中抱怨到将把所有的收入寄回家，因为“在这里一分钱都花不出去……无处可买任何日用品，唯有食品而已”<sup>(6)</sup>。

几乎所有的早期知识青年都着重强调他们从上海带往农村的各种各样的物资，从衣物、床上用品到洗浴用品、厕所用品、图钉与自行车。<sup>(7)</sup>食品是最重要的，城市青年通常携带着猪油、饼干、奶糖、面条、干肉、咸鱼、罐头食品与奶粉等前往农村。<sup>(8)</sup>

知识青年返回上海探亲并不仅仅为自己搜集物资，他们也寻找下乡当地村民所期待的物品。例如，下放云南的知识青年发觉能够在上海购买的染料粉深受傣族妇女的喜爱，后者习惯于用当地的植物与昆虫来制造染衣料。一位知识青年访问了上海的一家工厂，将制造猎枪的优质钢筋条

<sup>①</sup> 参见西双版纳农垦局于 1976 年 7 月 20 日提交的《农场知识青年的生活问题》的报告。

装入自己的呢布包之后，返回云南农村并将其交给自己的农民朋友。<sup>①</sup>

在许多地方，知识青年的存在创造了全新的经济关系，例如与当地人之物品交换、购买、销售以及贸易。农民有时用蔬菜来交换上海的奶糖与曲奇饼，而知识青年携带着上海制造的商品，尤其是肥皂块、小孩的衣物与糖果来表达他们对那些给予自身出行便利、暂时居住或者病中照料的当地人的感激之情。<sup>②</sup>在云南，上海知青从傣族村庄带回了热带水果；在黑龙江，由鄂伦春族猎人售卖的野猪肉与驼鹿肉具有很高的市场需求。傣族村民意识到知识青年愿意用现金购买水果，因此他们开始种植经济作物。<sup>③</sup>不断增长的需求拉升了价格的上涨：例如当大批上海知青到达之后，西双版纳的香蕉价格在1970年翻了一番。<sup>④</sup>知识青年也购买了当地的土特产并将其带回上海家中，包括云南与黑龙江的木耳，云南、贵州与江西的竹靴，江西的樟脑丸以及许多当地草药。这些产品往往并非由商店直接出售给知青，而是经由当地人之手，他们从售卖中能够挣得现金。<sup>⑤</sup>

为了实现财政独立，知识青年通常寻求挣得现金的途径。一名在江西农村做教师的上海知青为了赚钱就在闲暇时间带着照相机去农村，通过拍照来挣钱。<sup>⑥</sup>受到上海街边小贩的启发，一队黑龙江知青在返回上海探亲之后，获得了一台用于谷物、大米与其他粮食作物剥壳的机器。他们游走于当地乡间，借助其剥壳服务每天足以挣得10元以上。<sup>⑦</sup>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赚钱的行为并不完全合法。在黑龙江省逊克县，五名上海知青受到了批判，因为他们将从农村携带的1006斤粮食作物兑换为粮票，随后在黑市上将粮票出售以获取现金。<sup>⑧</sup>

一些村民的确建议知识青年想办法挣钱。在以粮为纲的原则之下，政府开启了持续的针对商业活动的打压。但是在帮助知识青年改善其生活条件的名义之下，众多农民以及乡村干部同知识

青年一道发展副业生产。在黑龙江沿岸的部分地区，利润最高的贸易莫过于伐木业。逊克县农民告知某些知识青年，当每年五月黑龙江的浮冰开始融化之际，从苏联一侧江边的某一木材储备厂所流出的原木将漂经他们的村庄。较之被分配在田地中劳作，诸多知识青年开始下河捞取木材，他们能够以每块30-100元的价格将其出售给需要木材进行建设的村民。一个“慰问团”调查了知识青年的境况并抱怨到为数不少的逊克县上海知青卷入到了搜寻与销售原木的活动之中。<sup>⑨</sup>

当知识青年尝试引入全新的耕种技术、机械设备与产品的时候，他们为农村的经济发展作出了更加直接的贡献。虽然他们被政府当局派往农村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是很多知识青年对当地落后的耕作方法深感震惊。一名下派云南的女知青抱怨到“傣族人依然处于石器时代。他们只是将种子撒下去并等待丰收时节而已。”<sup>⑩</sup>在安徽的一个生产队，上海知青张韧发觉当地人倾向于怀疑新的农业物种。为了克服他们的质疑，张韧亲自在她的自留地中实验新的棉花与大米品种，借以展示这些新品种的潜在收益。她的努力最终说服了村民来采用新品种，至少在她看来这显著提高了劳动生产率。<sup>⑪</sup>黑龙江的生长季节较短，农民主要种植土豆、大头菜、洋葱和大白菜，上海知青带来了南方蔬菜的种子并种植了雪里红、芥菜和花菜。他们也成功地向农村引入了黄豆，使得知青与当地农民能够享用豆浆、豆腐与食用油，并对农村产生了颇为实际的效益。<sup>⑫</sup>

同上海的联系对于上述改进农业生产的努力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名知青呼吁在黑龙江省极为偏远的呼玛县与四名同学一道组建一个“科学实验小组”：“我们远在上海的父母提供了相关实验所需的原材料”。该小组在实验室中研发出全新的小麦与黄豆品种之后，相关作物被村民所采用并种植到田地之中。<sup>⑬</sup>

① 参见2012年9月23日在昆明对Zhu Kejia进行的访谈。

② 参见2013年8月18日在上海对He Hua进行的访谈。

③ 参见黑龙江省嫩江县知青办于1975年4月7日提交的《1975年知青工作总结》的报告。

④ 参见黑龙江省嫩江县知青办于1975年4月7日提交的《1975年知青工作总结》的报告。

⑤ 参见逊克县知青慰问检查团于1970年5月提交的《逊克县知青慰问检查团工作情况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黑龙江省慰问团第八分团第三分队于1970年提交的《黑龙江省慰问团第八分团第三分队1969-1970年的报告》、逊克县知青办公室于1973年提交的《21号文件和30号文件的调查报告》。

⑥ 参见2013年8月18日在洛杉矶对Hu Pei进行的访谈。

种子并非由知识青年从上海带至乡村的唯一物品。一名前往呼玛县监管知青的上海干部——沈龙根——利用生病的契机返回上海，并将一台制面机送往农村。<sup>(15)</sup>下放贵州的陈健在同当地领导干部的谈话中得知村里一台拖拉机的轮胎损坏了。鉴于陈父是上海轮胎修理厂的一名技师，陈健借助父亲的关系得到了帮助，并成功地为所在村弄到了四个新轮胎。<sup>(16)</sup>

无论是为了自身的享受与消费、进行贸易或者销售，抑或是促进农业生产的改进，由知识青年个体所进行的物资传输仅仅是“文化大革命”阶段城乡之间所进行的极其广泛的材料物资传递的一个方面而已。对于地方领导干部来说——从生产队队长到乡村、县和地区的领导——分配到当地的知识青年提供了从城市获得资源的难得机遇，否则他们根本无从得到。

## 二、拖拉机与广播器材

为了弄清知识青年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角色，首先有必要窥探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相伴随的政府结构。由于知识青年的户口随其一道被转走（因此剥夺了他们在上海的合法居住权），城市官员原本设想上海市政府将不再对知识青年的福利承担责任，它将由知识青年所在的农村社群来供给。然而，很快发觉这场运动所造成的问题远比之前的任何设想要复杂得多。知识青年的父母（依然是上海市居民）发出了无穷无尽的抱怨，包括他们的子女在农村所忍受的极其艰苦的生活与工作条件，以及他们所经历的伤痛，这意味着尤其是政府如果还想动员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其中的话，上海市政府将被迫卷入到这场运动的行政事务中来。

每一个向农村下发了知识青年的主要城市都设立了市级的办公室（例如，上海市知青办），其处于中共中央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的领导之下。在市级知青办以下是地区知青办，后者负责监管学校与住宅区。虽然设置上述城市知青办旨在执行政策，动员高中毕业生前往农村以及分发由中央政府下拨的财政补助，但是他们的绝大多数时间却用于确保城市青年的非农就业。

知青办同样设置于每一个接收了知青的省、

地区、县和自然村。农村地区的知青办受地方政府的领导，并且在人事上通常受制于由所在省的中心城市的相关工作单位所下派的干部之手。这些知青办将受过教育的青年分配到生产队、分发政府补贴给那些第一年下乡的知青，并定期召集知青开会。最后，作为对开始显现出的问题之复杂性的回应，主要城市均组织了慰问团，它由代表市政府的领导干部所组成，旨在协助农村政府搞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些慰问团需要在农村耗费一整年。实际上，慰问团经常树立来自其所在城市的知青为榜样，并主持了涉及食物、住房乃至犯罪行为在内的调查。解决上述问题必然需要慰问团同地方官员之间进行协商。如下所示，鉴于慰问团受到了农村领导干部期望获得所需的原料物资这一压力，因此前者有时也代表了后者的利益。知青个人、慰问团以及位于上海和农村区域的知青办在协调物资转移方面都发挥了作用，后者涵盖了从上海到农村地区的农业工具与设备、机器零件、交通运输工具以及电力供应。<sup>(17)</sup>

在国家计划经济与物资分配的大背景下，农村地区与上海之间在个人以及政府部门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一个农村生产队期望购买诸如拖拉机等农业机械设备，即使它具有充足的资金，依然需要征得村、县、地区以及省的同意——这是一个漫长与拖延的过程，有可能是实质性的拖延，也有可能被否决。因此，村民获得拖拉机与其他农业机械设备的最高效率途径在于通过其与城市生产者抑或分配者之间的新联系。

地方领导人很快意识到知识青年在建立上述联系时的价值。1971年，江西省红旗村生产队期望通电，但是却面临电线短缺。电线对于上海居民来说可以从当地五金店获得，然而农村居民却不可得。因此，知青被派出进行“出差”来为所在村庄购买电线。一位女知青回忆到，上海的金店限制每一位顾客只能购买50米电线以备家用。她和全家人跑遍了上海市的一家五金店，直到购买了足够的电线以致装满了她的两个呢布包。<sup>①</sup>无论他们购得的电线对于支撑农村领导干部所预想的供电量而言是否充足，如若没有那些能够返回上海家中并有地落脚，同时得以动员全家人参与其中以致从五金店最大限度购买电

<sup>①</sup> 参见2013年8月18日在洛杉矶对Hu Pei进行的访谈。

线的知识青年的话，这一工程将难以想象。在江西省的其他县，上海知青帮助购买了电灯泡与扩音器；某一知青甚至帮助所在县从上海购得了一辆大货车。<sup>①</sup>

除了通过知识青年的个人关系网获得资源以外，地方领导人直接同知青办协商以便从上海获取物资。有时他们索要物资表面上是为了知青所需。在1969年末，黑龙江省黑河地区知青办请求上海市即刻为知青寄送1.6万双冬季鞋。<sup>②</sup>大约与此同时，云南某一地区请求为知青寄送1-2万双塑料鞋或者解放鞋与药品。<sup>③</sup>这些鞋子只是为了城市青年还是也将分发给农村居民则是很难决定的。

然而，在诸多案例中所要求的物资明显不全是为了知青的利益。例如在1969年九月初，黑龙江省委发展办公室委派三名同志赴上海。上海市知青办汇报到来访者的“唯一目的在于从上海市为知青所需要的物资分配寻求支持”，并且“可能的话，他们请求我们给予最大数量”<sup>④</sup>。所期望的物资清单涵盖了57项不同种类的汽车零件、140种拖拉机零件、33种工具、17种电器材料，以及文具用品、丝织品、药品和从短袜、毛毯到雨衣、围巾在内的五花八门的物品。上海市知青办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将相关请求传递给了有关的政府办公室，但也获悉了上述物品中的绝大多数在上海均属短缺。报告中遗憾地提到“我们所能提供的帮助极其有限”。所请求的354项不同种类的物资与原料之中，上海知青办仅能确保60项。虽然黑龙江省的领导干部表达了对所得物资的感激之情，但是他们尚不满足并“反复强调他们十分急切地需要相关物资”。未能获得所期待的回应，他们喋喋不休地说到上海知青的需求以便证明其物资请求的合理性：“知青们需要小工具和铁块来建造房屋与火炉……请将这些情况报告给上海市委领导同志”<sup>⑤</sup>。

最终上海市向黑龙江省寄送了一些物资，然而时隔两月，另一项再次以知青所需为名义的请求到达。给上海市知青办的报告写到“来自贵

地的一些知青告知我们由于上海知青的数量增加导致饮用水供应不足”。此外，一定数量的知青汇报到由于浅水井中的矿物质高度聚集以致得了关节肿胀。地方领导干部希望上海市政府能够提供挖掘深井的机械设备，以便知青能够享用安全的饮用水。<sup>⑥</sup>

出于对知青健康问题的关心，上海市知青办迅速联系了市有关部门。当相关部门回复到上海并没有充足的深井泵来满足其需要，然而知青办却向上海市政府负责人保证将顺利完成任务。上海市知青办在给黑龙江省有关部门的回信中说到能够马上送出10台泵，同时下一年将力争提供90台泵。信里总结到“请告知你们所希望的尺寸和类型。”<sup>⑦</sup>

最终，除了知青自身所需的医疗以及其他补给之外，黑龙江省从上海市收到了相当数量的设备。通过知青办，仅1971年上海市就提供了两辆公共汽车、13辆卡车、9台拖拉机、36台手扶拖拉机和若干“迷你汽车”，总计价值达106万元。<sup>⑧</sup>

黑龙江省并非唯一一个希望借助知识青年的存在以便从上海获得设备的省份。在1969年十月，江西省赣州地区的政府二把手向上海市知青办派出了一支由六人组成的代表团，以寻求物资支援。抵达上海之后，他们描述了赣州地区的情况，解释到当地十分薄弱的工业基础以及缺少机械设备与技术支持。代表团强调无论是当地农民还是5000名上海知青都急切地期望改善条件并自给自足。“为了促进农业生产”，代表团成员向上海市知青办阐释到，“我们需要建设一座能够年产30万只轴承的新工厂。我们期望上海将帮助自己得到相关机器设备”。他们还呼吁上海市为县级工厂捐赠用于机器维修服务、电力供应的设备。除此以外，他们希望得到用于灌溉系统的马达与水管。他们预想建立一座水泥厂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一整套设备——新的或使用过的均可。在赣州地区的山区部分交通很成问

① 参见上海市知青办于1969年10月27日提交的《关于加拨16000双棉胶鞋给黑龙江省黑河地区的请示报告》。

② 参见上海市知青办和马云水同志于1969年11月14日提交的《关于对云赣皖三省支援部分急需物资设备的请示报告》。

③ 参见上海市知青办于1969年9月1日提交的《关于黑龙江省要求上海支援物资问题的请示报告》。

④ 参见上海市知青办于1969年9月1日提交的《关于黑龙江省要求上海支援物资问题的请示报告》。

⑤ 参见上海市知青办于1971年11月21日提交的《致黑龙江省革委会》的报告。

⑥ 参见上海市知青办于1969年11月17日提交的《致黑龙江省革委会下乡上山办公室》的报告。

⑦ 参见上海市知青办于1971年11月21日提交的《致黑龙江省革委会》的报告。

题，因此代表团请求提供上海制造的交通牌卡车以及三轮拖拉机。此外，给予高质量的种子和优良的猪种以提高农业产量。最后，“为了宣传毛主席的思想”，他们迫切地需要电缆与扩音器。代表团还传达了一大期望——计划从上海迁往外地的任何工业单位在再选址之时能够考虑赣州。<sup>①</sup>

当上海市知青办的有关人员就获取这些物资同其他政府部门协商之际，来自江西省的六人代表团焦急地等待着结果。“我们带他们参观了上海近郊的一些农村”，上海市知青办工作人员说到。“他们能够挑选一些种子带回去。并且我们还带他们参观了上海轴承厂以及上海工业展览馆，以期他们能够为所在地区将来的工业发展收获灵感。”<sup>②</sup>

或许是因为赣州官员所做的先期调查研究使得建立水泥厂的请求造成了最为积极的结果。他们指出该地区每年需要用卡车运送 10 万至 20 万吨水泥，如果赣州能够运营自己的水泥厂的话，这一笔巨大的能源浪费就能够避免了。他们还揭露到听说上海水泥厂曾经使用过的一些旧机械设备业已在上海闲置十年之久。虽然上述机器早已生锈，但是赣州代表团仍坚持能够获得。然而与其他市政府部门进行协商却并非易事。上海市知青办被该市工业主管部门告知上海市水泥厂的三套抛光机业已被分配给其他地方，并且“烘干机”应该保留以作为该厂现用机械设备的后备品。然而知青办仍力促相关部门将机器设备让与赣州。<sup>③</sup>

上海市知青办很快意识到只要有知青下派之地，从上海索要物资的请求就难以避免。很快，来自安徽、云南和江西诸县的请求就难掩其不真实性了。知青办向上海市政府抱怨到“我们觉得他们索要得太多了，乃至超过了我们力所能及的范畴。”<sup>④</sup>

在同上海市知青办沟通源自农村地区的物资

请求之时，地方知青办之间进行了讨价还价，他们轮流同上海市有关部门进行物资传递的协商。受上海市政府的委派，前往知青下放地点的慰问团在沟通这些请求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例如，在 1969 年 12 月，云南慰问团团长给上海市知青办打来电话，说到云南思茅地区希望上海立即寄送 5 至 7 台业已答应提供的手扶拖拉机。<sup>⑤</sup> 在一份送往上海市知青办的名为“派出地能够为接收地做些什么”的报告中，身处云南省景洪地区的慰问团系统阐述了其自身关于应该寄送何物的主张。它汇报了当地在发展地方工业中所面临的困境，并建议了上海市有关部门应该予以帮助的方式。慰问团描述了当地一家拥有 229 名工人的造纸厂。虽然该厂拥有机械设备，但是它仅能生产质量低劣的包装纸。根据同一报告，位于勐腊的另一家造纸厂的条件更是极端落后，只能生产低质量的厕纸。慰问团建议上海市有关部门应该提供漂白原料和更多的技术来予以帮助。<sup>⑥</sup> 上海市知青办经常根据慰问团所提建议组织面向农村地区的募捐。<sup>⑦</sup> 当供应量不足之时，慰问团还需要向地方政府解释原因。<sup>⑧</sup>

往往通过慰问团的报告使得上海市的领导干部了解到农村地区的情况以及知青的迫切需要。认识到维持知青在农村的生活条件的重要性（也可能是对极其不满的城市家庭所施加压力的回应），上海市知青办有时发起对农村地区的设备捐赠。例如，在 1971 年中，上海知青办给云南省劳动厅写信“从我市青年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前往农村开始，贵省农村接收与安置了大批上海知青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感谢贵省的极大支持，我市计划赠送另一批 150 台手扶拖拉机。请将它们分配给有上海知青的地方。也请重点给予贫穷的村和生产队。”<sup>⑨</sup> 这些种类的物资在接下来的若干年中以这一方式被继续提供。<sup>⑨</sup>

上海市官员似乎尤为急切地向知青所在的农

① 参见上海市知青办于 1969 年 7 月 21 日提交的《致江西省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内务组》的报告。

② 参见上海市知青办于 1969 年 7 月 21 日提交的《致江西省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内务组》的报告。

③ 参见上海市知青办和马天水同志于 1969 年 11 月 14 日提交的《关于对云赣皖三省支援部分急需物资设备的请示报告》。

④ 参见上海市知青办和马天水同志于 1969 年 11 月 14 日提交的《关于对云赣皖三省支援部分急需物资设备的请示报告》。

⑤ 参见上海市知青办于 1969 年 12 月 20 日提交的《云南省思茅专区要求支援手扶拖拉机的报告》。

⑥ 参见上海市赴云南省学习慰问团西双版纳分团于 1974 年 11 月 23 日提交的《动员地区继续要为安置地区做些什么》的报告。

⑦ 参见上海市知青办于 1969 年 12 月 12 日提交的《致安徽省革委会上山下乡办公室》的报告。

⑧ 参见上海市知青办于 1975 年 6 月 23 日提交的《关于对下乡青年支援物资的落实情况报告》。

⑨ 参见云南省革委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于 1975 年 6 月 2 日提交的《关于了解拖拉机分配落实情况的通知》。

村地区提供广播器材。在许多无线电接收情况较差的偏远地区，借助扩音器的广播成为知青能够知晓区域以及全国新闻的主要手段。或许在上海市官员看来更为重要的是，设置广播站能够创造非农就业。鉴于在城市的学校中知晓了官方话语，受过教育的知识青年较之农民更能适应广播工作。当西双版纳收到了建立 50 座广播站的器材设备时，政府宣称每一个广播站都将把宣读新闻稿的任务分配给知识青年。<sup>①</sup>上海市知青办承诺到“如果他们架设广播电缆有困难，上海将提供援助。”<sup>②</sup>正是基于广播的重要性，甚至当地方官员并未提出请求之时，上海市知青办也经常提供广播设备。例如，上海市知青办提到接收了大批上海知青的安徽省淮北地区为了增加农业产量，请求上海市为其新建的灌溉系统提供 2000 至 3000 台电动机或者汽油机。“我们觉得这是很迫切的”，报告中说到，“如果我们不能立刻寄送那么多的话，就应该逐步地配送。我们也应该给他们一些广播器材”<sup>③</sup>。

最后，上海市政府能够将农村地区变成报废或老旧物资的出路所在。1975 年，上海市工业与交通领导小组宣称其管辖之下的 13 个部门将收集使用过的和积压的设备来“支援上海知青的下派地”。为达成这一目的，上述部门同意捐献 440 台机器和 3 万台引擎。<sup>④</sup>借助手头大量的剩余物资，上海市政府得以满足其他省份的请求。1976 年 8 月，上海市知青办通知吉林省有关部门，上海将从“剩余物资”中捐赠 135 台拖拉机以及其他设备给吉林，并提供一笔 10 万元的无息贷款。<sup>⑤</sup>

上海市绝非唯一一个向接收了本地知青的农村地区提供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的城市。根据北京市知青办的有关记录，他们也协调了向黑龙江、辽宁、山西以及内蒙古等地涉及柴油机、水管、卡车、三轮车、轿车、手扶拖拉机、缝纫机和书籍等在内的大量物资的转移工作，上述省份接收了大量北京知青。<sup>⑥</sup>1973 年末，北京市知青办草

拟了一项建议——在 1974 财政年度，市政府将价值 1374 万元的物资赠与北京知青的下派地。该建议囊括了送往农村社区的包括小汽车、拖拉机、电动机和农业机械等在内的一长串清单，以及转给知青的食品与药物。<sup>⑦</sup>

关于城市官员缘何愿意满足上述请求的一种解释在于下派偏远农村地区的庞大数量的高中毕业生本身。超过 110 万的上海知青构成了当时该市人口的 10%。几乎每一个家庭都至少下放了一人，包括所有层次的政府官员家庭。相关政府部门有责任使得知青自给自足并确保他们的福利水平，这对于城市社会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首要在于向知青提供日常生活所需的物资（书籍、毛巾、鞋子和药品）。如果农村的生产水平提高了（通过提供水管和拖拉机），那么随后下放至该地的知青的生活水平或许也将改善。更为紧迫之处在于提供使得在农村的上海知青能够远离农业生产的原料物资。

### 三、工厂

农村领导人迅速意识到上海市领导干部为知青创造非农就业机会的热情，正如他们急切地为广播站提供设备的举动。因此，地方领导人不仅请求支援农业机械，也如同赣州为其水泥厂寻求设备的请求一样希望索取建立农村工业的原材料。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毛泽东发出指示——“农民应该集体经营小工厂”。县与村都深受鼓舞，纷纷发展“小五类工业”：铁与钢、水泥、化肥、机械以及足以自卫和确保国家安全的军火。<sup>(20)</sup>然而，农村地区被期许自筹建设这些企业所需的绝大部分资金。<sup>(21)</sup>他们未能从中央政府分得任何资源，不得不自力更生地获取发展上述农村工业所必需的机械、技术设备以及熟练工人。<sup>(22)</sup>故而，对于远离工业中心的偏远农村地区来说，发展上述工业是一项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知识青年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知青

① 参见中国共产党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委员会组织部于 1976 年 1 月 15 日提交的《关于选拔吸收州广播电台工作人员的通知》。

② 参见上海市知青办于 1969 年 10 月 25 日提交的《关于外省要求上海支援广播器材问题的报告》。

③ 参见上海市知青办于 1969 年 10 月 25 日提交的《关于外省要求上海支援广播器材问题的报告》。

④ 参见上海市知青办于 1975 年 10 月 16 日提交的《致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的报告。

⑤ 参见上海市知青办于 1976 年 8 月 17 日提交的《致吉林省知青办》的报告。

⑥ 参见北京市知青办于 1974 年 8 月 26 日提交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对外省区的物资支援工作的请示》。

⑦ 参见北京市知青办于 1973 年 12 月 20 日提交的《关于 1974 年支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物资计划的请示》、北京市知青办于 197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提交的《市知青办关于支援上山下乡知青物资问题的请示情况》的报告。

办的存在为农村领导干部获取对于农村工业发展至关重要的设备和熟练工人提供了新的关联。

这正如乐安县工业主管部门借助其知青同上海之间的联系所示。如上文所述，上海知青魏民发现自身从在田间劳作被调动到了乐安县收音机与电线厂。魏民的父亲也参与其中，为乐安提供当地不可得的生产原料，县领导还从上海的工厂中招募到一批退休的“工人师傅”，后者将前往乐安以帮助建厂。尽管上海的退休技术工人支援外地的工厂颇为常见，但是他们在上海郊区就有着很高的需求，在正常情况下无论如何不会前往乐安这样的偏远地区进行帮助。和魏民的父亲一样，如果能够办到的话，上海的绝大多数父母或许都愿意帮助协调这些安排。确保他们的子女在县工厂里就业则意味着他们不必在田间地头干活。在魏民的案例中，类似安排的好处被证明甚至更大。与众多其父母同样对县工业主管部门提供了帮助的上海知青一道，魏民被派往其父在上海的工厂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培训。在接下来的数年里，魏民被数次派回上海以接受进一步的培训和其他工作。

一方面魏民及其父母必然感激于他能够返回上海的长时间出差这一机遇，而乐安县的工厂也从相关安排中获益。由于缺少熟练的抑或训练有素的技师，上海工厂提供的原材料将毫无用处。对乐安县来说，较之派出像魏民这样的知青，选派本地工人赴上海接受培训成本将更高且更为复杂，因为前者能够在家中吃住、在工厂中与工人用上海方言交流并且对交通轻车熟路。

乐安县收音机与电线厂通过知青同上海之间的联系至少还解决了另一个生产障碍。该厂生产的收音机电路板（以及电线）需要一种由铜和黄金所构成的合金，这一生产过程超越了当地水平。然而，当地领导干部找到并招募了一名其父在上海的一家造币厂工作的知青。随后，他们得以从上海搞到这种合成金属并将其带回乐安县。为了技术培训以及获得金属，知青此后频繁地赴上海出差。<sup>①</sup>

除了运用知识青年与其父母之间所建立的个人关系之外，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承诺提供非农就业以确保获得建立新工厂的资源。例如，云南省景洪地区勐混村的有关领导提议建设一座为上海知青提供就业岗位的木材加工厂。他们希冀从上海获得支援的请求始于其两大目标——“第一，响应毛主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第二，发展乡村工业以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sup>②</sup> 基于50名工人中有40人将是上海知青，他们开列了期望上海提供的物品清单。“我们将就地取材并尽最大努力解决困难”，村领导指出。事无巨细，他们计划将请求呈送到县政府和上海市慰问团。相关请求写到“如果我们不具有充足的启动资金与设备，乃至交通车辆和工具的话，则期待获得一笔贷款以及全套设备”。该报告继续写到：“我们建议上海市在建筑和家具制造等领域派出2或3名熟练技师，并提供为期三年的培训服务。”<sup>③</sup>

在这一案例中，知识青年的存在为在偏远农村社区建厂提供了可能性。在当时，类似勐混这样仅拥有热带丛林的贫穷傣族村落根本无法建立工厂。但是，与中国最为繁荣的城市之间的联系将这个偏远村落置于一种截然不同的地位。现在却能够期许由上海制造的机器设备被运输到建厂之地，一笔贷款将填补潜在的成本，以及城市技师将帮助挑选和培训工人来生产时尚的家具。<sup>④</sup>

虽然组建上海市知青办旨在执行政府关于将城市知识青年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政策，但是其现实中的绝大部分工作聚焦于确保知青的非农就业。在这一背景下，它动员上海市相关工业部门援建车间以帮助在众多农村地区建立小工业。根据上海市知青办的一份报告，援建这些新工厂的目的在于为知青提供就业岗位，因为基于一系列原因，他们不能（或许不愿意）种地。相关工厂中的绝大多数依赖诸如竹子和木材等本地资源。也有工厂生产工具、肥料、家具、染发剂以及食用油。<sup>⑤</sup> 1975年，上海市政府根据慰问团提出的建议派出了一支考察团前往江西省

① 参见2013年8月4日在上海对魏民进行的访谈。

② 参见勐海县勐混公社革委会于1976年12月4日提交的《关于以上海知识青年为主成立社办集体木器社的报告》。

③ 参见勐海县勐混公社革委会于1976年12月4日提交的《关于以上海知识青年为主成立社办集体木器社的报告》。

④ 例如20世纪70年代初期，呼玛县建立了一座木材厂，它拥有雇佣知识青年的潜能，两名来自上海家具厂的“老师傅”被派驻培训年轻的本地工人。参见刘世杰主编《呼玛知青风云录续集》，第182页。

⑤ 参见上海市知青办于1975年7月17日提交的《致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财贸组》的报告。



的赣州和井冈山，以帮助建设农村工业。这支有 17 人，挑选自上海市各政府部门的考察团与慰问团密切配合，提出了一项在上述两地兴建 75 个小工业项目的计划，并向上海市政府呈送了为上述工厂提供设备以及为交通提供 45 辆卡车的请求。<sup>①</sup> 派驻江西省上饶、宜春、抚州以及九江地区的慰问团也建议向另外 15 家工厂捐赠机械设备与交通工具。<sup>②</sup>

陪伴知识青年前往农村的上海市领导干部对于农村工业的发展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 5500 名上海知青被下放呼玛县之时，超过 450 名干部随行。这些领导干部中的许多人具备工业管理和技术专长，以及个人关系网，因此他们的到来成为令人兴奋的诱因。黑河县领导以往只能在这个小县城接触到极其有限的技术知识，于是立即组织了当地高级领导干部予以接待，并马上请求获得帮助以新建一座造纸厂。<sup>③</sup>

#### 四、书籍与技术

尽管并不明晰且难以测度，但是对农村发展更有价值的或许是知识青年远超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绝大多数知青是上海各中学的毕业生，还有一些是职业学校的毕业生。1969 年，呼玛县领导得知 104 名来自上海的技校毕业生被下放到内蒙古，以后所发生的一切足以佐证对这些学生的强烈期盼。由于该县急切地想发展自身的工业，县领导立即同上海市政府以及辽宁省政府（管理着内蒙古的部分地区）协商将上述学生调往呼玛县。他们成功地调动了 93 名知青。当呼玛县有关领导看望学生时，他阐释到呼玛坐落于中国的北部边疆，仅拥有为数极少的小工厂，并且不只是需要劳工而是更多的“人才”来建设国防。“你们将成为呼玛的生力军”，他说到，“同时我们十分欢迎你们”。自到达伊始，他们立刻被派往新建企业服务，以提供技术援助和劳动力。<sup>④</sup>

甚至在毫无正规技术培训的情况下，受过教育的知青也为农村地区提供了正常条件下无法获得的宝贵财富。缺少了能够阅读技术手册的个人

的话，一切旨在获得机械设备和工具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基于这一原因，很多农村地区让知青驾驶拖拉机、卡车或者操作机器设备。例如，呼玛县的交通小组主要由知青所构成。在漫长且寒冷的冬季的狭窄山区道路上运送物资需要的不仅仅是良好的驾驶技术，当在偏远地区孤身一人之际，维修车辆的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sup>⑤</sup> 这一问题在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最为明显。西双版纳的爱妮村购买了一台缝纫机，但是无人会用，直到两年后一名上海知青抵达方才解决。<sup>⑥</sup>

为了建立农村工厂，工人需要搞清楚怎样安装机器设备并解决某些难以避免的问题，而这一任务往往由知青来承担。比如，当呼玛县椅子圈电厂初建之时，蒸汽引擎不能有效工作，并且锅炉需要手工清理。两名上海知青，其中一人毕业于上海市化工技术学校，发明了一种能够用于清理锅炉的化学方法。他们耗时一周进行了若干次实验，直到得出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案。为解决水源软化过程中的问题，一名上海知青阅读并从该书中翻译了相关资料，以此为基础建造了一套全新的水源软化系统，从而使工厂能够生产出超过既定质量标准的水源。该知青还设计出一台装置，它能够控制工厂水箱的水线并防止溢出。<sup>⑦</sup>

除了知识青年早已具备的技术被送往农村之外，他们还拥有接受进一步技术培训的机遇，尤其是在返家期间。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上海市电教站与教育主管部门为知青赞助了一系列课程。上海市的 16 所大学相互协调，提供了哲学、政治科学、文学、历史和理学等课程。他们也提供涉及电工、木工、机械维修、农药使用、医药、缝纫和理发等培训教学。<sup>⑧</sup> 多达 16000 名知青在探亲期间接受了上述课程与培训教学。上海的大学教授们也前往农村地区亲自培训知青。1974 年，共计 28000 人接受了培训；而到了 1975 年，这一数字增加至 60000 人。<sup>⑨</sup> 由于知青所学到的技术将使农村地区受益，因此地方领导干部颇为热情地支持他们参与相关培训课程。

知青还能阅读众多的出版物，并将它们带到农村。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与 70 年代初，新华

① 参见上海市知青办于 1975 年 7 月 17 日提交的《致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财贸组》的报告、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于 1975 年 9 月 24 日提交的《关于支援本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地区和技术更新用机床、电机的通知》。

② 参见上海市知青办于 1975 年 7 月 17 日提交的《致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财贸组》的报告。

③ 参见 2012 年 9 月 23 日在昆明对 Zhu Kejia 进行的访谈。

④ 参见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于 2013 年提交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报告

书店运送了大量书籍，包括高级工程师的专业书刊、国外书籍与文章的翻译版，旨在对工人、农民、有文化的青年人传播技术的书籍。涉及科学种植、肥料使用、农业机械及其保养、家禽管理、木工业以及初级医药的书籍使得知青能够学到技术知识，随后相关知识将适用于农村地区的农业、工业和医疗事业的发展。<sup>(28)</sup>

## 五、遗产

如上文所述，知识青年办公室、慰问团与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以及上海市和农村地区领导干部之间的协商与合作，往往使得农村地区成功获得了工具、机械设备、工厂设备、熟练工人、培训机会，并且对上海工厂的实地考察将有助于特定物资的生产流通。

知识青年的存在对于那些期望发展工业的偏远地区而言具有一种特殊的作用。例如，坐落于黑龙江省北端、中苏边境地带的呼玛县难以获得原材料及设备。当知青初到之时，呼玛县的大部分区域没有柏油路、电力、邮政服务抑或电话通信。知青到来以后的若干年里见证了当地经济的急剧膨胀，包括建设了一家煤矿，生产农业机械、电动机、水泥、纸张以及砖头的工厂，食品、粮食作物与油料制造工厂，以及酿酒车间等。<sup>(29)</sup>呼玛县的拖拉机数量从1968年的48台增长到1979年的280台。<sup>(30)</sup>根据地方志，知青，尤其是那些毕业于上海市各职业学校的知青为几乎上述所有企业的建立提供了技术支持与劳动力。<sup>(31)</sup>在某村庄，一批知青在生产队内扮演了领导作用，采购了涵盖一台制砖机在内的众多机器设备、建造了一座小电厂、安装了一台发电机并铺设了电线。他们还购买了手扶拖拉机、一台油料加工机以及一台用于小麦和大米的打谷机。此外，他们对于铺设柏油路以及建造房屋和一座公共大礼堂也贡献甚大。<sup>(32)</sup>

呼玛县的物质改善以及农业与工业的发展程度也许是极其非典型的。它当然同众多事关“文化大革命”的学术研究所指出的经济停滞这一印象构成了鲜明对比。少量认可这一阶段农村经济增长的学术研究将其视作接下来的后毛泽东时代经济改革所取得进步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注脚而已。例如，有学者指出在1972至1976年期间

农村工业经历了迅猛的增长，尽管农业生产下降了。该学者将农村工业的这种增长归因于1970年二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领导人提倡“大力建设地方‘小工业’”。<sup>(33)</sup>接下来，针对这项政府政策的回应或许有助于解释农村的工业增长；然而，一些本应考虑进来的更为复杂的因素——如上文所示，政府未能为这项动议的实现配套提供任何资金或者设备——却被遗漏了。虽然不可能论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相关年份经济发展之间的确切关联，但是也很难忽略地方工业的增长与下滑同知识青年的到来与离去之间所存在的明显却又未获认可的相互作用。

知青自身的阐述以及来自地方档案的大量实时报告都清晰地表明知识青年在农村经济发展上发挥了显著作用，尤其对那些远离像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的地域来说，它们获得了原本不可及的物资来改善经济状况。在很多案例中，唯一可用的资源就是借助知青而搭建的人际关系网。在相关档案记录中表现得最为清晰的是地方领导人积极地、持续地、创造性地借助以上人际关系网，以及伴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而生成的政府官员结构所带来的关系网。这些关系网有助于为诸如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与知青被下放的偏远农村地区之间的巨大鸿沟架起沟通的桥梁。上述偏远地区的领导干部绝非仅仅向上海市知青办递交书面请求，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也亲赴上海以寻求获取资源。

与此同时，很大程度上由于下放农村的城市青年人数众多，上海市政府各有关部门担负起向偏远农村地区提供经济援助的责任。根据上海市志，它向接收上海知青的地区提供了价值1600万元的原材料，以及总计价值为5500万元的拖拉机、小汽车、卡车、水管和发动机。<sup>①</sup>由上海市政府官方分配的物资与资金的数量可能尚不及由该市工厂、商店、街道委员会以及学校通过在知青、其父母、慰问团成员、农村干部和农民之间所建立的人际关系网而寄送的资源。在强势的计划经济时代，偏远地区常常在资源分配中被忽略，而这些关联提供了对农村工业发展至关重要的原材料物资、技术培训以及技术支持的来源。知识青年有时不自觉地、有时主动地创造了超越毛泽东时代的城乡二元分割以及突破高度集

<sup>①</sup> 参见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于2013年提交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报告

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导致的跨区域交易限制的关系网。在这一背景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许呈现为一段被隐藏的“文化大革命”经济史，由知青个人以及政府官员结构所推动的原材料物资和设备的转移可能代表了一段先前被隐匿的知青运动史。

(参考文献)

- (1) Michel Bonnin ,The Lost Generation: The Rustication of China' s Educated Youth ( 1968 - 1980) .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3.
- (2) 知识青年被下派三类地点: 生产队、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 (A). //刘小萌. 中国知青史: 大潮 (1966 - 1980 年)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3) [4] Jeremy Brown ,City versus Countryside in Mao' s China: Negotiating the Div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pp. 1 , 1 - 2.
- (5) G. William Skinner ,Rural Marketing in China: Repression and Revival. The China Quarterly , Vol. 103 , No. 3 , 1985 , pp. 393 - 413.
- (6) [8] [9] [10] [11] 陆融. 一个上海知青的223封家书 (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9. 3 - 8 , 83 , 343 - 344 , 7 , 25 , 7 , 32 - 33.
- (7) 张亮. 从黑土地走来: 边境插队落户生活纪实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1. 105.
- (12) 于立波. 共和国知青 (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8. 71.
- (13) [32] 中共黑龙江省呼玛县委党史研究室. 呼玛知青风云录 (M). 内部资料, 2002. 214 , 203 - 219.
- (14) [15] [23] [24] [25] [26] [30] [31] 刘世杰. 呼玛知青风云录续集 (M). 内部资料, 2004. 82 , 82 , 610 - 614 , 182 , 83 - 85 , 50 - 52 , 8 , 34 - 43.
- (16) 上海知青网, <http://zhiqingwang.shzq.org/guizhouDes.aspx?ID=6793>.
- (17) Helena K. Rene ,China' s Sent - down Gene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Legacies of Mao' s Rustication Program.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3.
- (18) 上海知青网, <http://zhiqingwang.shzq.org/jiangxArtD.aspx?ID=4913>.
- (19) [27]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云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0. 3 - 26 , 3 - 26.
- (20) Carl Riskin ,China' s rural industries: self - reliant systems or independent kingdoms?. The China Quarterly , Vol. 73 , No. 3 , 1978 , pp. 77 - 98.
- (21) William Joseph ,Christine P. W. Wong ,David Zweig ( eds. )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pp. 183 - 196.
- (22) American Rural Small - scale Industry Delegation ,Rural Small - scale Industry in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 pp. 6 - 7.
- (28) American Rural Small - scale Industry Delegation ,Rural Small - scale Industry in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 pp. 246 - 247.
- (29) 中共呼玛县委员会. 呼玛县志 (M). 内部资料, 1980. 363 - 378.
- (33) Yang Dali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 ,Rura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orwar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p. 116.

(责任编辑: 青 成)